



钱若赓一案与被政敌诬告，令马文炜认识了明末官场从上到下的险恶，决定辞官。他拒绝上任浙江巡抚，毅然返乡独善其身。他建起有五间高房的院落，安丘及周围县镇在职官员、文人墨客多有登门拜访者。



王世贞画像。

视察萍乡督建城墙 官场黑暗心中忧苦

万历威逼马文炜将钱若赓收监一案，让马文炜看到大明官场的黑暗，他觉得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，维护的也不是公平正义，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。

在封建社会的官场，马文炜算是一名人品高尚、耿介廉洁的官吏。他曾立志对大明江山负责，对自身及黎民百姓负责，颇具爱国爱民、敢于担当的情怀。可不少经手的事，却很难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于是思想压力越来越大，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
江西萍乡早在东吴宝鼎二年(267)便

已立县。明正德七年(1512)，萍乡开始筑土城墙，后改为筑砖城墙。万历十二年(1584)，马文炜、袁州知府陶之肖来萍乡视察，督促知县沈君校建筑砖城墙，培石基，拓马道，城墙长918丈5尺、高1丈、阔9尺。城墙原开有四门，马文炜见东南方向民众整日出门挑水吃，就提议在东来阳门与南达秀门之间，加设三道小门，为民众提供便利。三道小门被百姓称作“水门”。还指示在孔庙前开辟禹门，镌刻门额，设立木栏并种植桃李，寓意桃李天下，以振文风。

十年前孝感建墙得鼎 被政敌诬告更加困扰

在江西巡抚任上，马文炜受到诬告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官场的厌恶。

十年前，马文炜组织民工建筑孝感城时挖得了仲山甫鼎。仲山甫，一作仲山父。樊姓的先祖，全名应叫樊仲山甫，西周周宣王的太宰，生前有功名受天子表彰。现文献相关记载见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，说和帝永元元年(89)秋七月，东汉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时，南单于送给窦宪一只古鼎，能容五斗，上有“仲山甫鼎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”的铭文。

据《孝感县志》载，万历二年(1574)，马文炜在德安知府任上领孝感拓展城墙，在建造孝感北墙时，民工挖得一匣，匣中出古鼎一件。形状为“蟠腹釜口、三足两耳，周园端严，体被五色，上有识皆古颌捕文，大小凡六十字。当时人乐道为祥瑞，遂筑鼎于其地，名为‘神鼎

阁’。”

马文炜得鼎后，鉴于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收藏家王世贞在万历二年(1574)监视湖广武举乡试及巡视今湖北十堰，马文炜便邀请他作宝鼎记。王世贞慨然应允，并在文中考订此鼎为周初南官仲父方鼎。

《孝感县志》卷五载：“乃请太仓大司寇王公龛州为记。王时以节钺镇抚郟阳，云所记缘其甚详：且摹宋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皆合，始知为商末周初南官仲父方鼎也。”

没想到此鼎成为政敌诬陷马文炜的利器。时临江太守因违反规约，遭到马文炜训斥，并条陈其罪上报。太守为自保，诬告马文炜挖出的“仲山甫鼎”被他私下交易或送了人。

清康熙《续安丘县志》卷十八《事功传》马文炜篇记：“(公)执法公正，群小忌之，乃以蜚语中公。谓公城孝感时，阙(通掘)地得仲山甫鼎，以饷江陵。然鼎故在署度，无恙也。公笑曰：‘伊尹负鼎要(要，同微，求取，有所倚仗而强求)君，子乃负鼎要相乎？’”意思是说：“从前伊尹以这件宝物扶国君，难道我在荆南用它扶张相不成？此鼎在仓库中完好无损，这谣造得太荒唐可笑了。”

马文炜说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，张相即张居正。

拒绝赴任浙江巡抚 坚决辞官回乡隐退

幸亏所得青铜鼎尚在库房，马文炜得以洗脱。另外，王世贞所考仲山甫鼎，也根本不对，《汉书》所记的仲山甫鼎已被窦宪上交国库，仲山甫封地是经几次迁移方到的荆楚，早与之脱离了干系。更兼几朝国库屡经乱世战火焚毁荡然无存，它又怎会再次在孝感出土呢？

马文炜上任筑孝感城墙得鼎实有其事，然此鼎并非薛尚功所考识的南官仲父第一鼎，凡字数及内容均与汉时“仲山甫鼎”所记傍铭不符，只是一未名彝器而已。明朝时，仲山甫钟鼎彝器已无存世，只存在于古史籍中。

临江太守的诬告又把早已不愿同流合污的马文炜推了一把，让他进一步看到了明末官场的复杂与凶险，遂萌生退意。并于万历十五年(1587)，即钱若赓入狱的第三年，向朝廷递交了辞呈。

年富力强的马文炜竟要辞官，万历接到奏报，甚是惊讶。于是决定给他换个地方，传诏马文炜任浙江巡抚。可他还是力辞不就。拖了一年后，万历便批准他还乡。万历十六年(1588)七月，马文炜离了江西，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两月有余，回归安丘。

到了故乡，他看到东许里(马家楼)旧居破败，就用积攒多年的俸禄，西迁三里地，在南潭湾北崖(今安丘南关印台之下、南关小学以东)，坐北面南建起有五间高房的院落，院大门朝向东南角而开。书房建在门左侧与高房同向，三间厅房前廊后厦，后墙留门与北院相通，前廊有朱漆明柱立于房门两边的石鼓上。进得门来，正中放着一套八仙桌椅，置放精美茶具，后面则是一靠山长几。上面摆放古玩，最北边立有四扇山水屏风，挡住后门，东间是书房，书桌上文房四宝，书橱内古籍巨著。

由于马文炜系在职而退，安丘及周围县镇在职官员、文人墨客多有登门拜访者。马文炜借机劝导他们要勤政爱民。住所每日里高朋满座，好不热闹，倒也比官场自在。

马文炜打算在接下来的时光中，集中精力为家乡编书著史，弥补书籍之缺。他深知安丘文献缺失的现状，认为“率多佚亡”“有其录而无其书者，十之六七也，岂不惜哉”。明末张贞《渠丘耳梦录》丙集“先贤著述条”转述了马文炜的这一说法，并列出了88种只留下书名的书目。